

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第一期短篇小说集

血型

AB50

杭州人民出版社

张石山 聂鑫森 赵宇共
傅星 王蓬 杨东明 贺晓彤

血型 A B 与 O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贵 阳

血型AB与O

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

第一期中篇小说集二

张石山 聂鑫森 等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

(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)

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2.25印张 2插页 282千字

1986年1月第1版 1986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0,250

书号 10115·626 定价 2.50元

出版说明

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（前身即文学讲习所），多年来培养了若干著名的作家，为当代中国文坛作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。文学院所开展的教学活动，实际上是我国当代文学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。

1983——1985年度的第一期（即文讲所第八期）学员，系中国作家协会的成员或各分会会员。其中不少人入院学习前，已分别荣获80、81、82、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。他们入院学习，是在各分会推荐的基础上，经过中国作协统一命题考试，择优录取的。因此，除了在文艺创作方面已有相当的生活基础和布局谋篇的能力之外，他们在哲学、文艺理论诸方面亦颇有功底。

本册所选七部中篇，以青年们关心的恋爱、家庭、工作、事业等为题材，歌颂新一代人热爱事业、追求进步、追求幸福生活的美好情操。

目 录

长长的坡·····	张石山〔1〕
他们从大山里来·····	聂鑫森〔92〕
圣 职·····	傅 星〔153〕
轮 声·····	赵宇共〔200〕
第九段邮路·····	王 蓬〔263〕
相逢在梅峰·····	贺晓彤〔314〕
血型A B与O·····	杨东明〔344〕

长长的坡

张石山

—

在我刚记事儿的时候，父亲在我心目中的形象特别高大神秘，宛若一尊万能的灵光闪射的天神。

其实，他只是一个工人。他干了一辈子装卸拉运的气力活儿，搬扛了一辈子麻袋之类。旧社会叫“吃脚行的”，是苦力工；新社会地位提高，叫搬运工。具体地讲，他是拉排子车的。排子车，是三个人合伙拉的那种大型平板车。一人驾辕，二人帮套。载重量五吨上下。

奶奶告诉我，我本来是在省城出生的。

省城刚解放，父亲接奶奶到省城来小住。那时，我不足四岁。父亲自然是天天上工挣钱，母亲也参加了工作，我不得不每天都被反锁在家，如一个小小的囚徒。奶奶知道了这种情况，自是心疼万分；而我的身边出现了一个慈祥的老人，也无疑枯苗得雨。

据说，我曾经策动奶奶一块逃跑：

“奶奶，你带上我，咱们一齐逃跑吧！”

奶奶一怔，定定地瞅了我半晌，叹了口气道：

“唉！好娃哩，奶奶脚小，哪能跑得动啊？”

“不怕！你拄上拐棍儿，我再搀上你，咱们跑吧！”

“唉，你爹舍不得你，他一下子就撵上咱们啦！”

我的逃亡计划自然没有实施。不过，奶奶独自回到家乡，却总念叨我的那几句娃娃话，竟至于积思成疾，病倒了。孝顺知名的父亲只好忍痛割爱，亲自把我送回家乡。据说，父亲只有一点不放心：

“这孩子，我将来要培养他念大学的，念法政大学——就怕在咱这老山沟子里待傻了！”

奶奶立即予以驳斥：

“我不知道甚的‘大学、二学’！——我只问你：你是咱方圆左近的人尖子啦，你是在哪儿待大的？”

结果，我便幸福地留在奶奶温暖的怀抱里。直到她老人家临终，在病榻上还问我：

“你记得吧？你爹舍不得把你留给奶奶，奶奶一句话，就把他截住啦！——你准记得吧？”

我不记得。

我最早的记忆是：当我起床的时候，奶奶盘着腿给我穿衣服，我站着和坐着的奶奶一般高；当奶奶插起门来洗脚的时候，她叫我背过脸去，我偷偷比量出我的脚和奶奶奇形怪状的脚一般长。

每年最热和最冷的时候，胡楂子铁硬的村长都要给奶奶送那种盖了好多图戳的牛皮纸信封来。他把信封对着光亮映照一会，还要放在耳边去聆听那轻轻揉动出的“哗啦啦”的响声，然后脸上现出为别人的喜事而得意的笑容：

“老嫂子！咱娃从省府又给你敬奉回票票来啦！”

奶奶同样现着笑容，忙着让座倒茶。我心中特别诧异：我的父亲什么时候成了老村长的“咱娃”的呢？而奶奶竟不作任何辩解。

夏天，奶奶就给村长沏一壶茶：

“你尝尝！这是他爹从省府买回来的叶子，又香，又打凉败火！”

那胡子围拢的嘴就忙答腔：

“是香，是打凉败火！”

冬天，奶奶则掀起羊毛毡的一角拍拍炕席：

“天冷，你快暖暖手！”

胡楂儿带着小冰珠子直晃荡：

“是得暖暖手，天冷！”

随后，老村长就总是把我冷丁抓住，用那猪鬃似的络腮胡子来扎我的脸蛋。我被扎得哇哇叫，胡子丛中发出哈哈的笑声……闹够了，他脸上复又现出那种为别人的喜事而得意的笑，赞叹道：

“好小子！你是个有福的呀！你爹在省府是挣大票票的呀！”

于是，我就不由自主地挺起小胸脯，仿佛自己衣兜里真的装着一块“福”一样。宝山哥衣兜里装着一块五花鹅卵石，不就是那样器宇轩昂的吗？同时，在我的想象中，父亲挣的票子一定很大：有毡子那么大，甚至象炕席一样……

其实，奶奶剪开信封取出的票票并不大，有的还很脏。这未免使我失望。而且，奶奶把钱币包进一块毛蓝布小包袱；用布条横三遭、竖三遭地绑紧；再把包袱掖到大躺柜的最底层；最后给大躺柜上了锁；还要几次扭着小脚返回头去检查锁严没锁严；到末了在屋子里转一圈，她手里那把明晃晃的铜钥匙不知什么时候

变没了之后，她总是长长地叹口气道：

“你爹做牛变马挣几个钱不容易呀！”

多半，她老人家眼圈会微微发红。有时，还要扯起衣襟来擦擦眼窝。

我记忆中第一次见到父亲是在一九五五年，我已经上学读书了。

那年，我们村成立了初级农业合作社。用上良种金皇后，施了化学肥田粉，生产大丰收。场院里谷垛绕四周围起城墙，金皇后尺把长的穗子堆成山。

宝山哥正带着我们一帮小把戏在谷垛旁边赶鸟雀，突然，场院当央响起一片喝彩声。我们奔近前，从大人胳肢窝下和裤裆底钻进圈子里，只见父亲正拉开架势搬麻袋。一只麻袋二百斤，父亲双手一搂，呼地捧起一人高，交到左胳膊下夹牢；抽一口烟，喷一团雾，道：

“这叫旱地拔葱！”

人群中有人发出啧啧声。父亲看也不看，“噗”地吐掉烟屁股，弯腰去搬第二只。他使右手将另一只麻袋扯立起来，倾头去用牙叼住一只麻袋角。人群立即静下来，只听得喜鹊在谷垛上喳喳叫。父亲右腿弓、左腿蹬，左半身上夹牢一只麻袋，右胳膊从地下那只麻袋半腰间一捞，“嘿！”一声喊，他已经夹着两只麻袋挺直了腰！大家伙儿“嘘”地吐出一口长长的气，同时好几个愣后生拍着大腿嗷嗷叫：

“好，好！”

父亲面不改色，只有眉梢儿得意地扬一扬：

“这叫双擒二虎！”

老村长——这时已有人称他老社长——爹着胳膊往前凑，看样子想帮父亲把麻袋卸下来。父亲喝一声：“慢着！”扭头招呼后生们：

“来！再给我肩上架一只！”

“这、这……你还行吗？”

“算啦，算啦！我们都服啦！”

父亲瞅瞅老村长，咬牙切齿地嚷：

“社长！你给后生们放话呀！”

第三只麻袋也高高地搁到父亲肩上了！

“走！哪个领我上仓库？”

父亲身负三只麻袋，一脚下去一只坑，一步落地一声响，挺挺地走出场院去。奶奶在场院边上切谷穗，挥着钐谷刀岔着声儿嚷：

“六娃！看憋坏气肠！看伤着筋骨！”

父亲竟还能喘着粗气逗乐子：

“妈！不怕！你生的六儿好骨头！最爱玩的就是这‘独镇三关’、‘霸王扛鼎’！”

在我的记忆里第一次见到的父亲，就是这样。他是一尊力大无穷的天神。

我那时八岁，已经能朦朦胧胧地听懂人言。父亲的“独镇三关”那样轰动了整个村庄，就连宝山哥都来讨好我，肯把他的五花鹅卵石借我玩一整下午。但我明白，父亲回乡决不是要现出天神的样子来给我看的；他只不过一时高兴，给大家伙儿表演着玩的。他另有公干。

第一，他捐助了农业社五百块钱。

头年开办农业社，地里的庄稼自古没长那么好。大家伙儿心

气一高，思谋想拴一辆胶轱辘车。老村长集思广益，决定给父亲写信：

“这么大的事，还能不和六娃商量啊？”

父亲接到信，即刻从省城动身回乡。社委会上甩出一沓票票来：

“咱石板沟拴起胶皮车，叫方圆左近、十里八里的开开眼！不要总低看咱小村小庄，不要总觉着咱这老山沟子里就没有人物！——多了，我一时也拿不出，这是五百块！任由你们拴骡子牵马！”

老村长不过意，连毛胡子乱抖颤：

“六娃，这、这么些钱，叫老叔该说啥好哩？这、这……”

“村长，你啥也别再说啦！但凡一个人，都不可忘了根本。我是打哪儿出去的？我在省城里如今混成个人样儿，见了村里的事绕道走，那我还算人不算人？我爹的坟头儿，我妈的门楼儿，我做儿子的不能叫挨指戳！”

父亲的义举自然博了个满堂彩。同样自然，也有人不买帐：

“五百六百，是给农业社哩，又没给咱一分镔子儿。咱不吃咸盐不咳嗽，不伸大拇指！”

“五百块钱算啥？人家在省府做大事业哩，票子来得发山洪似的！拿出一根票子毛来唬山佬儿哩！”

有一种譬喻说：小山村里的消息传播速度要比电报还快；而女人的舌头能赛过八百里加急的探子马。父亲从社委会出来，不过拜望了几位族中长者，回到家中一看，奶奶的脸早阴得快要滴下水来。

“妈，你咋啦？”

“不咋！有你这样会办事的儿子，妈还敢咋！”

“妈，是谁惹你生气啦？”

“你顶天立地的人物头儿戳在这儿，还能轮上别人来惹我？”

“妈，儿子哪里不对，你老人家多多指教！”

父亲倚在炕沿根儿，小半个屁股坐个边儿，双手撑在炕毡上，毕恭毕敬地听奶奶数落。奶奶对父亲有那样大的权威，我感到了一种替奶奶高兴的得意；而天神般的父亲一下子变成这种窝囊样儿，我又感到了一种替父亲委屈的哀伤……

爷爷死后，大伯就是我们这个大家族的家长了。他从地下灯影中那六七杆烟袋的火头儿当间站起来，替父亲讲情了：

“妈，六娃是人前头的人，办事也是走在人前头……”

奶奶截断大伯的话，软软地说：

“我还喘着这口气，你不也走到我前头来了嘛！”

煤油灯下，也不知大伯脸上是什么颜色。他扭脸看见了我，象是笑了笑：

“你知道个啥？眼睛瞪得明豆儿似的，还不睡？”

奶奶扭回身，轻轻地拍着我；在奶奶胳膊窝底下那空隙里，父亲笑咪咪地看着我。我睡着了……

第二天早上——也许是另一天的早上，我刚睁眼，只见满屋子的人，奶奶的炕上堆了半炕的棉花和布匹。父亲正在——分派——这是他回乡做的第二件大事。

说来有趣，在我们石板沟这个小山庄，当年土改划分成份时，贫农团根据的标准是这样的：海全老汉炕上铺着全村唯一的一条褥子，自然是地主；另外三户家里的老人睡觉铺着羊毛毡条儿，无疑算富农；炕上有整张囫圇席子的，中农；席子半破乃至全无的，下中农贫农……更有趣的是，依这样的标准划定的成份竟完全正确！

——如果有人见过如我小时在乡间所见到的事实，那末他对我们石板沟划分成份的奇特标准就能完全理解，而不以为特别奇妙了。

在我们石板沟，我刚记事那阵儿，全家只有一条裤子的户头并非少数；大闺女小媳妇只好闼起大门来赤身露体地洗衣服。万一不巧遇到亲戚上门，那就热闹了！弟媳隔着墙头喊：

“二嫂！快把你那裤子给咱扔过来！我家有客啦！”

二嫂就在那厢应声：

“三老婆，你甬慌！等我插上大门去！”

两妯娌一唱一和，有板有眼，只嚷得我们小山庄紧靠着的青石崖上起回声。在青石崖下那阳婆湾里晒太阳寻虱子的老汉们就一对眼：

“那是三姓保家有客啦吧？”

“许是，听那脆生生的嗓音儿，许是！”

而那吃了闭门羹的不速之客，见惯不惊，一边听着里面唱“二人台”，一边在门外悠悠地燃起一锅子旱烟抽起来……

象我奶奶，拉扯大七个儿子的老太君，也是在解放后才铺上了一块羊毛毡条儿。五位大伯一个叔，家家光板席子苦土炕，比起没有席子铺的光景已是大大地翻了身。

……父亲指指半炕花和布，给大娘为首的众妯娌安排活计了：

“大嫂，花我称好了，布我扯下了。怎么裁铰，怎么缝缀，你看着办，就甬叫咱妈费心了。——八条褥子八张被，你们六家一家一套：哥兄弟们都半辈子的人啦，也该知道知道躺在褥子上是怎么回事！咱妈跟前留两套，老人使上一套：毡子上头加褥子，总得比咱们高一层。另一套锁起，万一人来客到，有个支应。——妈，你看六

儿这样安排行不行？”

我是学过算术的，眼见那被褥多出来一套，本以为会有我的份儿，不料那是留给客人的。也不知奶奶会不会替我争一争？奶奶果然开言道：

“我铺着个毡条儿，本也就享福了。他爷爷赶入殓，才在尸身底下铺了块毡！你给妈置办下三面新的被褥，妈这辈子活得不冤啦！——我用的这疙瘩旧毡条儿，就叫你儿子铺了吧！”

家长大伯立即出面发言：

“就叫咱铁山铺了吧！”

众伯叔、众婶娘商量好了似的发一声喊：

“该当！”

铺不到褥子，铺到毡条儿也将就。那光板席子算叫我怕怕的了！

本来，我似乎记得我是在毡子上睡过的。那乡下人自己擀的粗毛毡躺上去的感觉并不亚于棕刷。然而有一晚半夜里，我见奶奶披衣下地，抓一把豆面来撒在了毡子上；第二天一早，大娘晨起洒扫，奶奶叫她先把毡条儿晾外面去。院子里立即有许多人大发议论：

“湿了？”

“尿了！”

“谁这么作孽？”

“还能有谁！”

“小的不懂，老的也不懂啦？一巴掌大的涎水娃儿，睡哪儿不成？”

“睡就睡呗，你甬尿炕呀！”

“晒着吧！幌子似的晾着吧！看他识羞不识羞！”

奶奶也许已经到了耳背眼花的年纪，自然听不到那一群婆娘家的议论；而我耳朵好使，而且确实也到了识羞的年龄：我哭了。

当日晚上，我自觉地睡到光板席子上。奶奶也没有来阻挡我。我蓦地明白了：她老人家并没有耳背到那种程度。众人的议论是对的，一位治理我们这个家族几十年的女性统治者，有她自己要保持的形象，有她必须遵守的某些准则。

光席炕，前半夜火烫，后半宿冰凉。而且，不论凉热，身上的皮肉都要毫无例外地嵌进那席瓣儿当中去。翻身的时候，仿佛正被揭下一层皮来：嘶啦啦响，钻心疼。万一尿了炕，那就更糟，泡胀了的肉皮更深地嵌下去，简直和炕席融为一体。第二天，脸蛋上和屁股蛋上的血印一律会疼到后半晌去……

奶奶放话，家长号召，族人响应。那毡条儿是我的了！我甚至想当众表态：我保证不再尿炕啦！

“不成！”

父亲不答应。

我怀疑自己听错了。我诧异地去瞅父亲：

你有五百块钱给农业社，有八套被褥给奶奶和众伯叔以及什么客人，就没有给你儿子的一块旧毡条儿吗？

父亲板着脸扫了我一眼，严肃地说：

“不成！这孩子，你们不能宠坏他！我象他这么大，肉皮儿连光板席子都没沾过！睡觉铺羊毛毡，倒把他金贵的！——这孩子，我是要培养他念书上大学的，上法政大学！法政大学，简单的吗？从小不吃苦，不受罪，长大能成个气候？他要念成了法政大学，穿绸裹缎，还稀罕一块羊毛毡？就怕他不是那块料，熬吃

傻穿，是一架造大粪的机器！那我把丑话给他讲在头里：不好好念书，甭说铺羊毛毡，讨乞到我的门前我乱棍打出！——小子，听见了吗？”

我听见了。震耳欲聋，心旌摇撼。但我不明白，“法政大学”和“毡条儿”中间怎么是那样一种奇妙的联系。我只知道：我必须好好读书，一直读到什么“法政大学”去。我立下一桩最初的誓愿：我将来要自己挣一块毡条儿！父亲在家的那一段，每晚我看都不看奶奶的旧毡条和新被褥，总是一头扎在那咬人肉、揭人皮的光板席子上……

第二年夏天放暑假，父亲托人带我到省城住了些日子。我第一次亲眼看见了父亲做的那种挣大钱的大事业。如果说，因为那块小小的毡条儿，我心目中曾经存下了对父亲最早的芥蒂，那么，这芥蒂在一瞬间化为乌有了……

乡间的生活是很苦的，但日子久了也就惯了。况且，大家都那样儿，我怎么会与人不同而特别地感到苦呢？

比如，我是六岁上山砍柴的。手心里攥满水泡血疙瘩，手背上尽是血道道；扛着罗圈粗一捆柴回村，满街的人还要逗趣儿：

“嗨！这是给喜鹊搭窝哩吗？”

可奶奶说，我父亲他们五岁就上山了。我六岁上山，她老人家已是特别放宽了尺度。她见我挑泡的时候龇牙咧嘴的，放下脸来训斥道：

“没出息的！一个人转生到世上来，怕做营生还能成个人？——去，磨镰去！下午还上山！”

又比如，我们村家家户户几乎全年都吃糠。老百姓常说：三天不吃糠，肚里没主张。谁家要是玉菱面里不掺糠，举着黄干粮

上街，老者们就要拿烟锅子捣脊梁：

“穿上裤子才几天？石板沟放不下他啦！”

到农事大忙，各家才蒸点儿黄干粮。而且，只有下地的受苦人才有权享用。家里的女人和孩子照例还吃糠干粮。我们家，大娘捧了一簋子干粮端上两种色儿。黄的冲着奶奶和大伯，黑的留给宝山哥和我。有时，奶奶会用筷子把簋子转半个圈儿，道：

“宝山半大后生啦，地里顶上苦了，叫他吃块精面窝！”

大伯立即使筷子原封将簋子转回去：

“他那嘴倒细！‘一对一’的糠干粮够他享用啦！我照他这年岁吃的是‘一对三’！”

有时，大伯会夹一块黄窝头放我碗里：

“这小东西眼珠子灯盏似的，尝块精面窝！”

奶奶立即劈手夺过去，一掰三瓣儿：

“数他小！他以后吃好东西的日子长着哩！不能纵着他！——他尝一块，宝山尝一块，给你媳妇留一块！”

再比如，我们下大雨不兴穿鞋。“蹬倒山”结实无比，可是雨水一泡，砂石路一磨，几天就毁了。要在山里遇了雨，我们一群小伙伴就一律脱下鞋壳儿，掖进柴捆里去。然后，一队光脚丫子在山道上溅着水花儿劈哩叭啦地响……

光脚的不笑没鞋的。大家都那样儿，祖辈都那样儿，我怎么会另给自己设想一种样儿呢？

然而，进了省城，另一种样子的生活奔来眼底，搅乱心中那旧有的并不复杂的思维程序了。

城里的孩子不穿我穿的中式对襟褂，不剃我剃的马鬃鬚头，下雨天要穿鞋，而且穿的是胶皮鞋！

我想有一双胶皮鞋。